

讨薪之痛让城市尴尬

“讨薪之痛”关乎的不仅是钱 1月16日 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李鹏

春节临近日,讨薪进行时。如同定期上演的“大剧”,爬高、静坐等追讨拖欠工资的新闻再次屡屡见诸报端。讨薪不止,在深深刺痛着公众神经的同时,一个回归本源的问题是,为什么被欠薪的总是打工农民?

新华时评一评

自2003年全国启动清欠农民工工资活动以来,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治理已度过了10余个年头。10多年来,国家对拖欠打工农民工工资的打击力度不可谓不大。从法院的讨薪绿色通道、人社部门的劳动监察,再到将不讲诚信的“无赖企业”、“黑心老板”清除出市场、欠薪入刑,制度在完善,恶劣行为却始终难以禁绝。

根治拖欠打工农民的薪水,更要还打工农民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身份和地位,坚决保障其劳动收

入权益。在逐步提高群体地位的同时,将打工农民纳入与城市工人同等的劳动保障体系之下,确保各项政策落到实处。

网友声音

@工资论者:又到一年讨薪时,讨薪之痛何时能得到缓解?

@云转身:拖欠工资者嚣张的底气源于未付出高昂代价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中国的城市也有季节性,年头和年尾不一样的风景。每到开春,城市就开始张罗招工,还推出多项

免费求职的政策,美其名曰“春风行动”。这个时候的城市,又是讲“多元”,又是讲“包容”,什么“来了就是某某人”、“新某人”……姿态放低,好话说尽,目的就是忽悠农民兄弟进城打工。可一到年底,城市就开始“变脸”,打工农民兄弟“讨薪之痛”有多深,城市所谓“包容”的尴尬就有多大。

城市的薄情必然会遭到“反弹”。可以预见,年关一过,不少城市又会嗷嗷叫喊“招工难”。所以,即使不谈什么公平、正义、权利等,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,也该解决“讨薪之痛”的顽疾。

书记扫厕所的时间点也值得商榷

书记扫厕所反见旅游治理乏力 1月16日 新京报 斯远

如果旅游城市连旅游公厕都臭气熏天,甚至“劳驾”书记亲自去扫,这给人的印象,未必是书记勤政,而是旅游环境治理乏力。据报道,1月13日下午,云南大理州委常委、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走进桃源码头旅游厕所。厕所年久,是老式蹲坑、便槽,臭气熏天。褚中志左手拿笤帚扫烟头,右手持铁钳,清扫了20分钟。

新京报一评

书记能去扫厕所,这事本身并无不妥。每个公民都有责任保持城市环境清洁,书记亲力亲为,说不定还能带动更多人行动起来。不过,扫厕所终究不比乘地铁,是职责范畴内的必要体验。比起工作时间扫厕所,书记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。

市委书记本职在“治吏”。一个臭气熏天的景区旧厕所暴露出的,除了卫生问题,更有当地旅游硬件的滞后,有城市管理者的治理不足,而市委书记也有必要以此为镜子,照出履责中的缺失。

网友声音

@葛祖康:官者管也,除了处处要以身作则,体恤民情,还要适当的亲力亲为。但主要是有智慧有能力将下属管好,使人尽其才,物尽其用,事事处处为百姓所想。

@文看客:你能天天扫吗?

@参政议政一:哪怕你天天去扫厕所,以你一个人的力量又能扫多少座?这样的“亲力亲为”不可取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这年头的新闻时兴“偶遇”,大理市委书记褚中志在景区扫厕所,似乎也归于“偶遇”之列。书记“偶

遇”厕所,或者记者“偶遇”书记扫厕所,都表达了陌生化、稀缺性以及冲突感。从这个意义而言,书记平时难得一扫,偶尔扫一下也无妨。

不过,褚中志扫厕所的时间点却值得商榷。从报道来看是周一下午两点,正是工作时间。当然也可以说扫厕所是工作一部分,但纳税人“购买”了书记的服务,是盼着书记完成书记的职责。如果让书记代替清洁工,违背了劳动分工原理,也不符合经济学上的“比较优势”,总之是“不科学”。而“科学”的做法,是市委书记经常利用业余时间扫厕所,既解开“偶遇”嫌疑,又回避了“不务正业”的指责。

一定要将公园的“公”字还给大众

关闭公园会所无关微观经济干预 1月16日 京华时报 兰立露

针对“会所中的歪风”,北京釜底抽薪,关闭市属公园内的私人会所和高档娱乐场所。诚然,把公园内的会所关闭,并不意味着会所的绝迹,但会所中歪风的猖獗,有公园会所的推波助澜;板子打到会所身上,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间就不会有新的歪风出现,但公园会所四处开花,的确对风气的形成有不良影响。

京华时报一评

北京关闭公园里的会所,不仅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,而且是对公园功能属性的正本清源,是一种合乎本身职责职能的管理行为。

正如北京所指出的,公园内租用合同到期且与公园功能无关的场所一律不得出租,确保公园更好地面向游客、服务群众、提高质量,此之谓也。关闭公园会所,既还百姓以其服务功能,又堵住了领导干

部搞歪风的一个出口。

网友声音

@姑布子卿_:北京柳浪庄公园是海淀公园的一部分,以前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在里面烧烤、垂钓,后被建成会所,还我市民的公共绿地,追究决策者责任!

现代快报再评

公园本姓公,是属于大众的休闲场所。但一些城市的公园管理者却擅自改变公园的用途,兴建所谓

“私人会所”,让贵人隐匿其中花天酒地。这种将公共产品变成“俱乐部产品”的行为,哪是什么“微观经济”?好听点说是“以公谋私”,无论出租者、承租者还是消费者,都各怀鬼胎。不客气地讲,就是在抢劫公共利益,而且还是明目张胆的“炫耀式抢劫”。

“炫耀式抢劫”败坏了社会风气,损害了政府形象。对这类抢劫行为必须零容忍,该停业的停业,该整顿的整顿。总之,一定要将公园的“公”字还给大众。

“没有时间表”体现有限理性

解决一票难求需要的不是时间表 1月15日 北京青年报 张天蔚

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,中铁总公司负责人表示,目前解决“一票难求”没有时间表。即将到来的2014年春运,是2013年3月成立的中铁总公司首次承担起春运这一超级重任。能否顺利完成转制后的首次春运任务,不仅是对中铁总公司的考验,也是对中国铁路系统改革成果的阶段性验收。

北京青年报一评

承认解决“一票难求”没有时间表,既可以视为稳妥保守的公关策略,也不妨看作对“一票难求”难题的清醒认识和客观态度。

事实上,面对年年春运一票难求的现实和由此形成的舆论压力,原铁道部曾经数次开出让人充满期待的“时间表”:2007年,原铁道部发言人称,到2010年,一票难求“将得到很大解决”;2009年,这一承诺改为到2012年“可基本解决”;

2011年又改为到2015年,一票难求“将成为历史”。

网友声音

@Bopsy:无奈的铁路公司。

@骄子blog:其实是无解的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公共权力的运用有两种模式,一种建立在无限理性基础上,自以为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,包揽并统领社会生活的一切,许诺一个“美好天堂”;另一种建立在有限理性

基础上,知晓不足与局限,懂得节制与谦抑,尊重并吸纳民众的智慧。铁道部门在改革后虽然政企分开了,但中铁总公司仍然承担一定的公共权力。在解决“一票难求”的问题上,改革前的做法显示出无限理性的自负,不断地承诺,并不断地“跳票”,损害了公信力。这一次,中铁终于承认“没有时间表”,这样的表态恰恰体现公共权力的有限理性:认识到困难和不足,毫不隐瞒地透露实情,既满足了公众知情权,也是对公众智慧的尊重。

别再让“劝捐”玷污公益

红头文件劝捐“仅供参考”也不行

1月16日 燕赵都市报 余宗明

据报道,近日网曝浙江台州发红头文件——《关于在市级单位开展“助力五水共治”捐款活动的通知》,在公务系统劝捐,并按级别制订捐款额。

燕赵都市报一评

为劝捐发红头文件已经是个错误,按级别划定捐款额,更是错上加错。它以“级别论”托底、“一盘棋”统筹的劝捐思路,本质上就是逼人就范。

现代快报再评

公益事业有赖于公众的广泛参与,这就少不了要用劝捐的方式来引导或激励。但劝捐的要义在于“劝”字,巴菲特和比尔·盖茨就经常满世界跑,鼓励各地的富豪捐款,这种利用自身影响力、感召力的劝捐模式是“柔性劝捐”。与之相对应的是刚性的“劝捐”,要么用红头文件,要么下达领导的口头指示,要么计入考核标准等,让被劝者无所选择,只能服从。所以,这样的劝捐也可称为“野蛮劝捐”。尽管它出于良善的动机,但违背了公益事业的平等、自愿原则,玷污了公益的本意。

酒店餐桌岂是议政场所?

“县委书记酒店办公”即便误伤也是伤

1月16日 四川在线 张述

近期,一张陕西蒲城县委书记在酒店餐桌办公的照片引发网民热议。对此,渭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在官方微博发表回应称“由于蒲城县宾馆会议室容纳人数有限,才选用宾馆餐厅包间为临时讨论地点”。

四川在线一评

餐桌和开会,本来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,然而,蒲城县的这张照片却生动地显示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。尽管看起来确实合情合理,但却还是有些让人犯嘀咕:什么地方不好选,非要选到餐桌上?

现代快报再评

渭南市人民政府出面回应蒲城县委书记酒店餐桌开会事件,不是下级单位给上级领导“背书”,而是上级单位对下级单位作调查鉴定,有一定权威性。不过,渭南的回应只是解开了公众对公款吃喝的疑虑,并没有抓住事件的要点。如果只是一般性质的办公或者开会,在酒店餐桌旁“因地制宜”也未尝不可。但这是人大会议,是在议政,必然要有一定的庄重感和仪式感。哪怕条件再简陋,也应在适合开会的严肃场所举行,选用宾馆餐厅的包间作为“临时讨论地点”,不妥。

本版特约主持人 李鸿文

(资深时事评论员,专栏作家)